

从上世纪70年代末算起,中国大陆学者们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已经30年有余了。从研究台湾文学起步,到香港、澳门文学,再到东南亚华文文学以至于欧美澳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研究的力度越来越深。在内地文学研究领域,这个曾被称为“弱智学者”的不入流的边缘项目(够不上称学科),如今已蔚然成风,竟成了一门显学。值得称道的是,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已经有了一支长期稳定、老中青结合、阵营壮大、水平很高的队伍。还有不少跨学科资深学者不断地主动作为“票友”客串其中,使研究大为增色。上百部的研究专著,超万篇的学术论文,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界定、研究范畴、研究目的和方法以及分布状况、各自特点,各地区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发展历史和当今态势,都有了充分研究和精深论述。全国大学几乎所有的文学本科都设有世界华文文学的基础课或选修课,硕、博士论文在当代文学研究生点上,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几乎过半。而立之年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可以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已经相当成熟、完整,发展的前景也令人乐观。这与文学类其他学科的建设相比较绝不逊色。可是,就在学术界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看好的情况下,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业内同仁中,却往往会出现一些妄自菲薄的声音,什么“界定不清、对象不明”、“水平不齐、缺乏领军人物”、“研究有偏颇、有空白”……总之,“还不成熟”。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说,这都是好心人的一片苦心,可良好愿望与客观实际似乎有些脱节了。比如,界限不清、对象不明的问题,在1993年江西庐山的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就有人提出来了。大概有这样几种意见:一是说,世界华文文学的提法是台湾首先提出的,大陆学者不能跟随其后。今日看来,这已不值一驳了。二是说,那么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包括不包括在里面,为什么研究对象总不见谈中国大陆的文学?这其实也讨论了20年,就是个约定俗成的事。国家社科规划中,世界文学就是研究中国以外的外国文学,难道中国不在这世界上吗?研究中国文学,也分古代、现代、当代等,只不过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从略了。第三种意见是,海外华人用英语、西班牙语等其他语种创作的文学作品就不能算了,这公平吗?这又把问题复杂化了。科学的界定总该有一个依据的标准,华文文学是以语言种类为标准的,而华文文学则是以种族为界定的,也有的分类是以政治、疆域、地区为界定标准的。我总认为,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以语种来界定最为科学合理。更何况,华文(汉语言文字)已经是海外千百万华人固有的精神家园、情感寄托和灵魂归宿,难道不值得我们专门认真研究吗?至于海外华人的外语作品,有中译本的应该一视同仁,纯外语的也可作为对照参考来研究,但就不是华文文学研究的重点了,试问,当下华文文学研究队伍中,精通外语文学并能做精深研究的能有几人?

另外,“水平不齐”是所有学科研究中必然存在的问题。只要有一批优秀的高水平的领军人物带好队伍,大胆热心地培养好接班人,研究水平是可以逐步拉齐的。现实情况是,我们的确已经拥有一批优秀的学术领军人物,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批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武治纯,中山大学的封祖盛、王晋民,厦门大学的黄重添,北京大学的王景寿,还有南京的张超、福建的林承璜等,他们已经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每当缅怀起他们的努力和贡献,我们怎敢妄自菲薄。同时,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领导机构的成员,不仅是学会的组织者,也是学术的带头人。他们都是著作等身、颇有建树的专家,并且都带领着研究的团队。他们对于提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去年11月,学会与台湾地区的世界华文文学协会在广州举行了“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文友共同研讨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成果和努力方向。这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30年的一个总检阅和新的里程碑。每念及此情此景,我们还能妄自菲薄吗?

当然,与其他各门学科一样,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还存在不少问题。30年来作家作品的研究不少,但研究史和史论不多,大部分研究还未能突出海外华文文学“多元文化、多重视角”的特点和优势,显得平板而老套。有些研究者对文本的研读不够深透,评论写得华丽而不切实际,套用西方的甚至是理工科论文的刻板模式,洋八股味十足(这与目前大学学报的死硬规定有关)。评论与创作脱节,各行其是;作者说得天花乱坠,读者不知所云;评论隔靴搔痒,评者自我欣赏,而作家不感兴趣,等等。30年来,世界华文文学日新月异,迅猛发展,而相关文学评论显然已经滞后了,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这些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但即使这样,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只要研究者能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迎头赶上,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前景仍是一片光明。

究;二是学科的特殊性;三是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形成一套自己的学术话语;四是需要有一批学术带头人和研究团队,若干研究基地;五是要有本学科或本研究领域奠基性的著述;六是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中有其地位。华文文学学科化要把这些方面做得更明确、更扎实、更厚实些。

不少学者强调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要争取由上到下在体制上的确认,更多与会学者达成共识,认为华文文学研究应该有自己的标志性成果。曾敏之谈到世界华文文学迄今为止缺少系统完整和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成果。陈公仲主张对学科建设的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将散兵游勇集中起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出更多标志性的成果。朱双一建议出版成规模和有影响的学者自选集和博士论文丛书,壮大学术队伍。张福贵提到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潜概念,文化取胜是最终胜利,应把华文文学研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来看待。

在讨论中,学者们谈到,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学科建设是关键问题。王列耀指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合法化到学科化的过程,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也在发展更新之中。张福贵做了学科建设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华文文学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具有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宏大和丰富的文化意义,其科学性与学术性必须注意三个概念:大中华、世界文化和创作与研究的一体化。基于此,他认为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真学术概念,要有学科自强意识。杨匡汉认为华文文学作为新兴学科已经合法,但从学科化的角度,应该具备六个要素:一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语境中生成和生长的文学以及对它的研

(梁燕丽)

陈映真小说集《忠孝公园》:彼岸的精神骑士

□唐佩佩

的真实写照,他在小说中所进行的批判和自省,体现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爱国主义情怀,使他成为当时时代、社会和历史中知识分子的先行者。

无论是从文化史意义,还是从思想史意义、艺术审美意义上来说,陈映真都是台湾乃至中国文学的光荣和骄傲。

其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和“潜隐的价值”都值得进一步探究和挖掘。

首先,陈映真小说中始终涌动着批判现实主义的潜流。他师承鲁迅,又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以理性批判,否定的笔触深入台湾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善于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省籍矛盾,首开“大陆人在台湾”题材之先河,将大陆人和台湾人的沧桑传奇和变化作为着眼点。在《将军族》中写身为大陆人的国民党退伍人员“三角脸”和台湾娼妓“小瘦丫头”从相爱到从容殉情的故事。他写出了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和当时社会的黑暗,对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做了历史主义的分析,从文化风俗上表达了对海峡两岸的认同。

其次,陈映真在小说中展现了强烈的宗教意识和死亡、救赎情怀。或许是自小就生活在浓郁的基督教氛围中,陈映真小说中充满着悲悯和博爱的宗教情怀,因此他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有着原罪意识和忏悔意识。《我的弟弟康雄》写康雄内心深处的俄狄浦斯情结面对“宗教的道德律规”的矛盾心理,在不断的煎熬、忏悔中,他还是无法赦免自己,最终自杀以求解脱。《六月里的玫瑰花》里面的巴尔奈因屠杀了许多人而受着灵魂的煎熬,终被梦魔所缠绕。《山路》中的蔡千惠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救赎家族的罪行”中,但是最后发现在“物欲横流的浊世中”已然丧失了当初的理想和信念,在痛苦的自疚中慢慢死去。此

后,随着政治思想的进化,陈映真开始质疑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意识,质疑标榜上帝为主宰万物的“神”的地位,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陈映真在作品中倾注更多对博爱和牺牲的人性光辉的观照,将自己的社会人生理想注入其中,以此来抵御资本主义商业之下的物化和人的异化,追求更高的人性价值和理想信念。

还有,陈映真的作品中也体现着对民族主义品格的建构。陈映真被誉为是真正代表了“台湾文学良心”的知识分子,冒着“犯法”、“坐牢”的危险探索历史的真相。这起源于他对日据时代长达50年的殖民文化的反思。日本在台湾近代历史发展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不论是社会政治、经济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台湾的现实问题、台湾民众的思想和追求都是与“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侵略息息相关”的,就连潜藏着的“台独”思潮也是其开出的“恶之花”。所以陈映真建构起一系列“反帝民族主义”理论,在小说中大力抨击帝国主义入侵残留下殖民思想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对人性的物化和异化。在《夜行货车》中刻画了林荣平和詹奕宏面对美国老板对中国台湾的辱骂和对女职员的非礼等丑恶行径时的不同态度,前者的奴颜婢膝和后者强烈的民族气节形成了鲜明对比。《万商帝君》塑造了“跨国公司的必然性格”,思考台湾的资本主化与人性的冲突。《忠孝公园》中所提出的“林标现象”是“经过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人面对的一系列身份认同”的危机。陈映真本着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爱国主义热情希望能够克服新旧殖民主义残留下来的异化意识,建立自己的民族品格,将华夏优秀传统发扬光大。

陈映真正是以一个文化自觉者的身份思索着台湾的命运,关心着台湾民众的福祉,并以深邃的目光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独立发展,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和值得尊敬的。他的作品是对台湾不同时期历史、社会、人性的深刻书写和揭示,是台湾发展的一面镜子。他对于人的价值、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的追求代表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对于当今时代的发展不愧为一种新的“启蒙”。

陈映真可称为台湾文学界的“一面旗帜”,正如李欧梵所言,陈映真是台湾文坛少有的知识型和信念型的作家,他的知识领域不限于文学,更注重思想;他的基本信念也不限于政治,而更注重人道主义。纵观台湾文坛,最具深度、最有代表性、最受期待,最不能被中国当代文学忽视的巨大存在,应首推陈映真。

自1959年发表处女作《面摊》跻身文坛之后,陈映真一直笔耕不辍,直至1987年《赵南栋》发表后即停笔转向文学史、政治经济的研究。十多年之后,其中篇小说《归乡》、《夜雾》、《忠孝公园》又相继问世,笔力愈发炉火纯青。他的小说文字独具魅力,思想层次分明,以恒久的悲悯之心观照现实人生,对不同时期的台湾文化做出了不同层面、不同阶段的审视与思考,其主题也不断演进——从关注人间苦难到思考民族的分离,他不仅写出了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底层人民的爱恨与挣扎,还将笔触深入到外省人与本省人的沧桑传奇以及省籍矛盾之中,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在树立自尊自强的民族旗帜、呼吁人性的复归、反思高压政治、表现时代风云变幻等方面,可以说,陈映真的精神探索从未停止过。

陈映真的小说选本《忠孝公园》是江苏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现代文库”系列之一,编者“本着全面体现作家创作的历史进程和作为不同阶段作家代表作品的选编原则”,收录了陈映真不同时期的小说《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将军族》、《唐僧的喜剧》、《六月里的玫瑰花》和《万商帝君》,是这一阶段陈映真小说的主要特点。1983年后,陈映真的创作更多地关注时政,使得此后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政治小说”色彩,《铃铛花》、《山路》和《忠孝公园》均是第四阶段有影响的作品。这些小说或表现二战后台湾急需清理的精神废墟;或表现对20世纪50年代台湾政治“白色恐怖”的否定(如《铃铛花》);或表现对民族分裂主义和跨国资本之于台湾人民经济上和精神上再殖民的批判,揭示日据统治后人们身份认同和精神回归的问题(如《山路》、《忠孝公园》)。总的来看,陈映真所创作的小说是台湾风云变幻、激烈动荡时代

张晓风散文点滴

□王理行



近期我看了几位台湾作家的散文集,当然谈不上对台湾散文界有较全面的了解,对大陆的散文虽有过关注,但了解肯定也不全面,但脑子里偏偏产生一个以偏概全的念头,即仿佛台湾散文的成就最高;在台湾,出版商都明白,散文书最有销路。

在策划英文版“20世纪中国文学选集”套书时,我特意专列散文卷,后来请国内中文系和外文系的知名专家学者们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明知英语国家的读者不太重视散文,我们更需要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学中散文这一文类的重要性和受欢迎程度。这和张晓风散文观中提及的老外重戏剧轻散文而她视写散文为大业相一致。

张晓风说,在西方,散文是三大文体(戏剧、小说、诗歌)之外的小附庸。在中文世界,散文是二分之一的擎天柱(我们分文章为“散文”、“韵文”两类)。读者希望从散文中得到好文笔、好修辞、对人生的观察和体悟、感性的感动和知性的深度。很少有人会“再一次读看过的小说”,可是有很多人“一再读他看过的散文”。

《圣经》和《论语》是对张晓风影响最大的书,堪称中西合璧。她散文中体现的原型,涵盖中外神话、宗教、民间传说,寓言、童话及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她的散文呈现出强烈的唯美倾向及诗的特质,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融汇于一种大格局中,并继承中国散文以诗为主轴的精神,成就其风格独特的美文。

“爱我少一点,我在风我在海我在陆地我在星,你必须少爱我一点,才能去爱那藏在大化中的我……去爱一首歌好吗?因为那旋律是我;去爱一幅画,因为那溢流的色彩是我;去爱一方印章,我深信那老拙的刻痕是我;去品尝一块佳酿,因为坛底的醉意是我……”多美的语句啊,我忍不住要抄几句张晓风的散文与君共享!

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每一个作家,一定要使他的雌雄两性成婚,一定要躺下来让他的脑子在黑暗里庆祝它的婚礼。”宏伟的艺术心灵达到了自身雌雄两种人格的交替互动、共生互补以至结合,就可能孕育出新的强劲的文学生命。张晓风的散文里就“有一股勃然不磨的英伟之气”。身为女性,张晓风散文的美学人格却常常体现出男性特征,她笔下的散文可抒情、可咏史,恢弘博大、文道兼具。

“有一个名字不容任何人污蔑,有一个话题不容别人占上风,有一分旧爱不准他人来置喙。总之,只要听到别人的话锋似乎要触及我的中国了,我会一面谦卑地微笑,一面拔剑以待,只要有一言伤及它,我会即刻挥剑求胜,即使为剑刃所伤亦在所不惜。”张晓风心里的中国,是散在全世界有待像拼图一样聚拢来的中国。一直以为中文系更适合培养理性的学者而不是感性的作家,但张晓风始终认为,写作既来自感性的生活,也来自理性的学问;学问虽然不等于生活,却可以提高对生活的诠释力,一个作家最好能做到二者平衡。她的治学方法、修辞训练以至整个文学人格的形成,都是在大学中文系完成的,她还成了发扬中文捍卫中文者。

癌说:张晓风的散文是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全新风貌:熟悉来自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纵的继承,新鲜则是世界文学和现代生活交互影响后的横的移植。其学思历程,如余光中所言“自传统出发走向现代,复又深入传统”。她的作品,不仅可以作文学欣赏,同时也有文化上的、语言学上的意义。

动态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复旦召开

本报讯 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主办,复旦大学中文系、暨南大学文学学院承办,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同济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和苏州大学文学学院协办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近日在复旦大学召开。学者们讨论了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问题,阐述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命题。95岁高龄的曾敏之先生在主题发言中说: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也已成立了10年。2011年11月学会和台湾华文作家协会联手在广州举行会议,并产生了促进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广州宣言”,这个宣言对海峡两岸华文文学发展将起到深远的影响。他希望“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带来新的可喜的收获,希望与会者各尽所能、各尽所思,形成世界华文文学活动的力量,对全国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会上,与会者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做了回顾和展望。张炯认为,从港澳文学到东南亚华文文学和欧美澳华文文学,从个别作家作品研究到地区性作家群和文学史的研究,再到综合性的世界华文文学史撰写;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身份研究等

多视角跨学科的研究,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已奠定了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成熟学科的学术基础,但仍需进一步拓展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填补研究空白,重视双重文化背景和文化表现,在微观研究基础上加强宏观研究,特别是开展经典化研究,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础夯实得更厚实。一些学者谈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观念更新和理论建设问题。刘登翰指出华文文学研究经常比较滞后,建构独特的华文文学诗学是当务之急。华文文学研究初步阶段资料建设是最大障碍,如今深化阶段理论建设成为最大问题,因此应从根本上研究华文文学的发展模式,揭示中华文化进入其他文化所产生的各种变化和各种学术生长点,并与中国文学的研究形成一种对话关系。曹惠民也强调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建设,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应从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度,他特别呼吁加强中青年学者的理论建设。刘俊也强调世界华文文学应建立起新的独特的学科传统,有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把握住自身领域的学术特点,创造出自己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创见性的成果。学者黄

华却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渗透有利于本学科的建设,应当主动与其建立起交叉联系,

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学术成果丰富了,

这个学科自然被承认。学者钱虹也认为,

关注世界华文文学的学者,大多从现当代文学转过来,这并不妥,他们具有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作为基础,这样的立足点不低,当然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应不断拓展,同时培养学科的学术新人也很重要。

在讨论中,学者们谈到,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学科建设是关键问题。王列耀指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合法化到学科化的过程,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也在发展更新之中。张福贵做了学科建设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华文文学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具有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宏大和丰富的文化意义,其科学性与学术性必须注意三个概念:大中华、世界文化和创作与研究的一体化。基于此,他认为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真学术概念,要有学科自强意识。杨匡汉认为华文文学作为新兴学科已经合法,但从学科化的角度,应该具备六个要素:一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语境中生成和生长的文学以及对它的研

究;二是学科的特殊性;三是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形成一套自己的学术话语;四是需要有一批学术带头人和研究团队,若干研究基地;五是要有本学科或本研究领域奠基性的著述;六是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中有其地位。华文文学学科化要把这些方面做得更明确、更扎实、更厚实些。

不少学者强调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要争取由上到下在体制上的确认,更多与会学者达成共识,认为华文文学研究应该有自己的标志性成果。曾敏之谈到世界华文文学迄今为止缺少系统完整和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成果。陈公仲主张对学科建设的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将散兵游勇集中起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出更多标志性的成果。朱双一建议出版成规模和有影响的学者自选集和博士论文丛书,壮大学术队伍。张福贵提到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潜概念,文化取胜是最终胜利,应把华文文学研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来看待。

汪义生强调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要有政治意识,要有政治的大局观。陶然谈到香港文学对于“人心回归”也起了很好作用。关于拓展研究范围的问题,张炯提到对澳洲、南美、日本、非洲和北欧的华文文学研究得不够或完全没有研究。潘耀明则强调华文文学研究要从民族性到普世价值拓展认识领域,从移民作家到本土作家普遍受到关注,同时与传媒相结合,重视传播环节。

（梁燕丽）

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出版

本报讯 由钱虹主编的“雨虹丛书·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共10种,目前已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齐。该套丛书从酝酿策划到最后一部作品出齐,历时3年多。已出版的10种作品中,有小说集5部,包括严歌苓著《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陈若曦著《慧心莲》、虹影著《女子有行(修订版)》、陈漱溟著《双姝恋》和婴宁著《男人的泪(修订版)》;散文集4部,包括吕大明著《世纪爱情四帖》、尤今著《菩萨的境界》、吴玲瑶著《幽默无处不在》和容子著《老来风情》;以及由谢馨所著诗集《脱衣舞》。在每部作品中,还收有钱虹撰写的入选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论

文。该丛书凸显了性别意识,编者认为,几千年来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形态,使得女性在历来由男性书写的文学史中,成为被他人书写、塑造和代言的角色;而女性介入书写,尤其是自我书写,就意味着这种被他人书写、塑造和代言的历史的终结,而在女性书写过程中,其性别意识及其特征会或明显或隐秘地镌刻在其创作文本之中。在海外生存的华人女作家,要在母语创作上取得优异成绩并且得到承认极为不易,因此,该丛书也是对20年来海外华人女性书写成就的回顾与检阅。(华文)

